

DOI: 10.16750/j.adge.2022.02.001

研究生教育规模预测与中美比较

张 炜 汪劲松

摘要:介绍了美国高等教育规模的预测与结果,回顾了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预测、规划与实际值,梳理了高等教育规模预测误差的主观因素、方法局限和政策影响。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和质量还将继续提升,研究生教育规模预测需要兼顾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根据预测,我国授予硕士学位的数量将在2023年超过美国,而授予博士学位的数量可能在2030年接近美国。由于我国人口为美国的4倍以上,每十万人人口的研究生教育规模与美国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应基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继续探索研究生教育规模的预测方法,科学客观地预测和比较中美两国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应适度超前布局研究生教育,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

关键词:研究生教育;规模预测;普及化阶段;中美比较;超前布局

作者简介:张炜,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教授,西安710072;汪劲松,西北工业大学校长,教授,西安71007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教育部《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显示,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183万人,毛入学率54.4%^①。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规模和质量还将继续提升,特别是研究生教育迅速增长将成为一个显著特点^[1]。伴随我国“十四五”乃至中长期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和质量将更加引发关注,既要科学预测和合理规划,也要回应各界的关心和质疑,服从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和规律,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

一、中美关于高等教育的预测及其结果

预测是开展研究、制定规划和完善政策的重要手段,高等教育规模预测有助于确定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和要求、完善和调整高等教育相关政策、提高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但是,准确预测高等教育规模的难度较大,不仅一些著名学者的预测会出错,

美国教育统计机构的预测也存在误差。

1. 美国的相关预测与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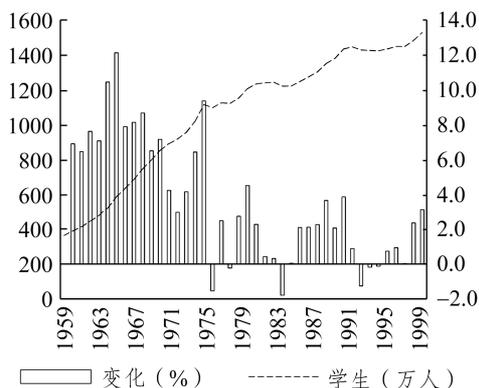
克拉克·克尔于20世纪80年代预测,美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18—24岁)在其后20年将下降25%,高等教育注册学生人数将相应减少5%~15%^[2]。马丁·特罗也指出,1979年美国高中毕业生达到300万人的峰值,1991—1994年将下降到230万人,当时的多数预测都据此认为,1979年起美国高校注册学生人数要开始减少,但事实证明上述预测的结果都是错的^[3]。

美国教育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简称NCES)数据显示^②,1960—1980年是美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时期。1980年,美国学位授予高校注册学生1209.69万人,是1960年的3.11倍(见图1)。1980—2000年,美国学位授予高校注册学生人数继续增加,2000年达到1531.23万人,是1980年的1.27倍。可见,在此期间美国学位授予高校的注册学生人数并未像诸多预测那样出现下降,只是增速显著降低。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2020年第1期应急管理项目“新时代行业特色高校治理模式与创新发展研究”(编号:72041014)

①如无专门说明,本文关于中国的数据均来自国家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教育统计数据”历年的电子版(http://www.moe.gov.cn/jyb_sjzl/);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的电子版(<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②如无专门说明,本文引用美国的数据和资料均来自于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教育统计摘要》(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历年的电子版(<https://nces.ed.gov/programs/digest/>)。



注：1960年、1962年的学生人数为插值计算。
图1 美国学位授予高校学生人数变化图（1959—2000年）

NCES 通过计算人口中 18 岁青年的数量和移民数据，对美国高中生毕业率、大学生毕业率、高等教育入学情况等进行测算，再根据每一项指标的权重，做出高等教育规模的高、中、低三种预测方案^[4]。

NCES 关于授予学位的预测数据，初期误差较大。例如，1996 年对 2004—2005 学年授予学术博士学位数量的预测，比实际值低了 21.83%；2001 年对 2009—2010 学年授予硕士学位数量的预测，更是比实际值低了 45.29%。2008 年之后历年关于 2018 年授予硕士、博士学位数量的预测，误差呈下降趋势，2014 年之后关于授予博士学位数量的预测误差已收窄到±2%以内（见图 2），授予博士学位数量的短期预测精度有所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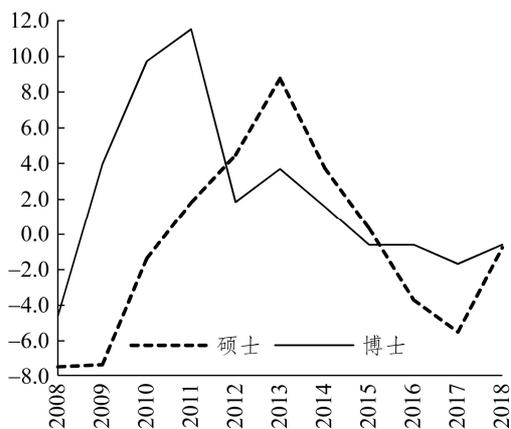


图2 NCES 2008年后对2018年美国授予研究生学位数量的预测误差（%）

2. 中国的预测、规划与结果

早期对于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预测大多都低于实际值^[5]。例如，按照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安排

部署，“2000 年在校研究生的规模比 1992 年翻一番”^[6]，但 2000 年的实际值是 1992 年的 3.19 倍；“九五”计划到 2000 年在校研究生规模达到 20 万人，也不到实际值的三分之二；《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报告（2002—2010）》提出，到 2010 年在学硕士、博士研究生数量分别比 2000 年增加 4.36 倍、1.51 倍，而实际结果分别为 4.71 倍和 3.33 倍，对于博士研究生规模的预测偏差更大。

近年来，短期预测的精度显著提高，2016 年别敦荣老师团队测算，到 2020 年我国在学博士生规模为 41.7 万~44.02 万人^[7]，预测上限值与实际值（46.65 万人）较为接近，仅相差 5.97%。

二、预测误差的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规模预测出现误差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三个因素值得关注。一是预测者的主观因素，二是预测方法存在局限性，三是国家教育政策的变化。

1. 主观因素

预测者自身的主观认识和外部舆论会对预测方法乃至结果的选择和解读产生影响。

从高校的视角，作为“学术部落”，高校多数时候对于环境变化的适应是“迫不得已”的^[8]，尽管也有一些“不跟风”“保持冷静”的案例，但是在资源配置和市场需求能够较好满足时，多数高校对于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政策是“积极响应”的，长此以往形成了潜移默化的作用。2015—2016 学年，美国授予博士学位数量最多的 10 所高校，其博士学位授予数相较于 2000—2001 学年都有所增加（见图 3）。其中，诺瓦东南大学增长了 44.44%，明尼苏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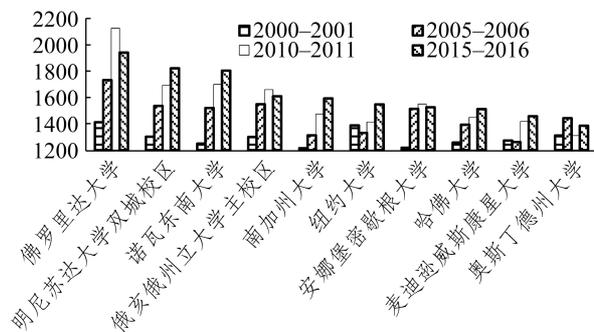


图3 美国授予博士学位最多的10所高校授予博士学位数量变化图（人）

大学双城校区增长了 39.94%，佛罗里达大学增长了 37.46%，哈佛大学也增长了 20.29%（从 1257 人增加到 1512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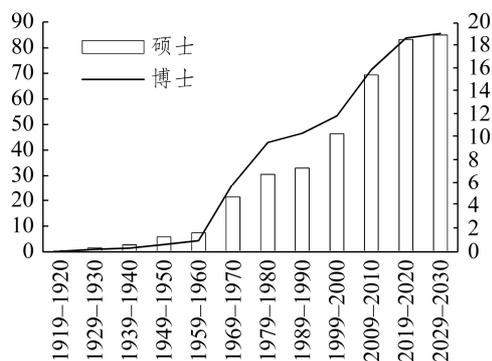
社会上对于研究生教育规模的观点存在分歧甚至对立。有的人会依据一所学校的研究生规模来看待大学的声誉，“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中，每年授予博士学位数量达不到 20 个，就不能列为博士/研究型大学。有的人则会担心规模对于质量的影响，学生人数“越多（质量）越差”的观点在美国也很有影响，对于规模的质疑始终伴随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即使在“二战”后的快速发展时期，关于美国高等教育即将进入“冰河时代”、高校注册学生人数将大幅减少的观点依然流行，有文献甚至预测学生人数将下降 40%~50%^[9]。

1970 年，美国授予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数量分别是 1960 年的 2.02 倍、2.87 倍和 6.05 倍。面对如此高的扩张速度，加之美国政府对高等教育和研发经费投入相对减少，美国学术界对高等教育的未来“充斥着遗憾与失落情调”^[10]。1998 年，菲利普·阿特巴赫指出，尽管大学远非要崩溃，依然是强有力的机构，但美国和欧洲 20 世纪中期大学繁荣的“黄金时代”已经不复存在，大学前所未有的增长和扩张时期可能已达终点^[11]。

总体上看，上述因素使得对于高等教育的规模预测趋于保守，但实际与一些谨慎的预测结论相反，美国授予硕士（主坐标）、博士学位（次坐标）的数量自 1919—1920 学年以来持续增加（见图 4）。需要关注的是，美国在 1970 年前后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12]，而这也正是其授予硕士、博士学位数量的快速增长期。同时，对美国 2029—2030 学年授予研究生学位数量的预测结果是仍然呈上升趋势。

在我国，1986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 1.9% 时，就有文献对于扩大规模提出质疑。高校扩招之前，也有文献认为高等教育规模不能再扩大了。高校扩招启动后，我国快步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在使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时，关于“过度教育”“质量下滑”的担忧增加，这有助于社会各界、特别是高校保持清醒的头脑，持续关注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但也使得一些预测者持更加保留的态度，加

之对美国授予博士学位规模的误判，质疑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进程过快和规模过大的观点流行，对于博士生教育规模的预测绝大多数都低于实际值。



注：2019—2020 学年后为预测值。

图 4 美国授予研究生学位数量的百年变化图（万人）

2. 方法局限

1952—1980 年，我国先后编制了 5 次高等教育规划，编制方法称之为“两上两下”，整个过程主要体现了供给约束。1983 年编制 2000 年人才预测和十五年教育规划，开始尝试从需求的视角来论证发展速度^[13]，但如何准确分析需求及其与供给的关系，促进高等教育人才供需的数量平衡、结构平衡与质量平衡^[14]，还在不断探索和完善之中。

预测技术发展至今形成了众多的方法，据不完全统计已达 150 多种^[15]，有一些方法和模型较好地模拟了高等教育的历史数据，也在稳定发展阶段较好地进行了短期预测。采用规模时序模型进行趋势外推，根据历史数值以时间为变量进行趋势分析^[16]，是一种常见的预测方法，在外部环境不发生大的变化时较为有效，特别是在短周期内较为准确，但由于信息更新、模型差异和政策因素等的影响，也可能产生一定的预测误差。

研究生教育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可以根据人口的发展变化来规划和发展研究生教育，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和造福人民^[2]，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生招生规模每一年的变化（主坐标）都会与人口的变化（次坐标）相一致（见图 5）。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人口年度增长速度放缓且波动不大，与研究生招生人数增长速度大幅变化形成强烈反差，研究生招生年度增长速度与人口年度增长速度相关性较弱，二者相关性系数为 0.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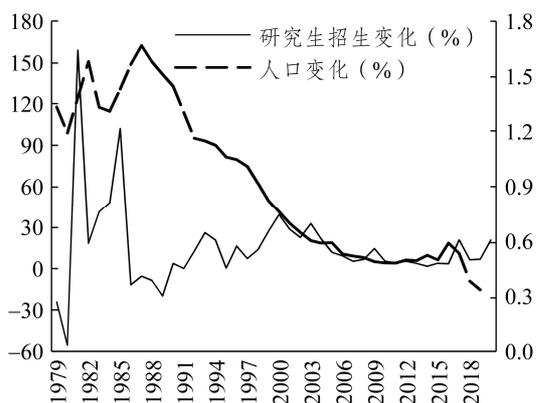


图5 中国研究生招生规模与人口的年度变化图(%)

1981—202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14.25%,这既为研究生教育发展提供了财政支持,也对研究生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17],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生招生规模与GDP的变化在每一年都会保持同步。在此期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年度增长速度与GDP年度增长速度的相关系数为-0.006,证明二者没有相关性。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年均增长速度低于GDP年均增速1.58个百分点,有25年研究生招生规模的增速都低于GDP的增速,波动幅度也较大(见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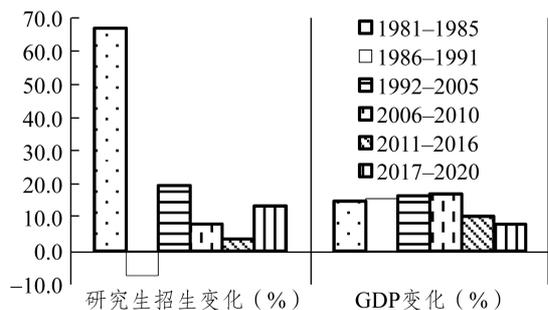


图6 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变化与GDP的年均增速(%)

如图6所示,1981—1985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的增幅很大,年均增长高达66.93%,远高于GDP的年均增速(14.93%),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初期的迫切需求和原来的基数偏低,也是对研究生停招多年后的补偿;但1986年起研究生招生规模压缩,1986—1991年间年均增长-7.33%,而此间GDP继续保持年均15.65%的增速,二者增速出现背离;1992—2005年是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连续14年的高速增长期,年均增长19.63%,高于GDP年均16.53%

的增速;2006—2010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增幅回落,年均增长8.09%,而GDP的年均增速进一步提升到17.08%;2011—2016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增速进一步降低,年均增长仅3.64%,尽管GDP的年均增速也出现回落(10.41%),但二者仍有较大反差;2017—2021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再次提速,4年年均增速13.49%,而GDP的年均增速进一步回落(8.01%)。

3.政策影响

美国高等教育乃至研究生规模的形成,是政府研发经费和学生资助政策、经济社会对人才需求、高校发展模式选择及学生意愿等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联邦政府并不直接规定各高校研究生的招生限额,但实际上通过研发经费和学生资助从宏观上影响高校研究生招生的数量,公立高校还要受地方政府经费预算的制约。

在我国,国家招生政策特别是指标限额直接影响研究生招生规模,每年招生政策的确定,是对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也受到财政经费预算的制约,而多数高校都希望扩大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招生规模。

1949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仅为242人,1953年猛增到2887人,年均递增85.85%。1965年,研究生招生规模下降到1456人,此后中断了12年。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当年招收10708人,是1965年的7.35倍,但随后两年招生数量又出现下滑,政策几经调整,研究生招生规模波动较大^[18]。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在学研究生要达到200万人,但《“十三五”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规划》做了政策调整,要求保持研究生培养规模适度增长,2020年在学研究生的目标提高到290万人。为了实现新的目标,2017年硕士生招生数量的增幅高达22.54%;博士生招生数量的增幅比上年翻番,此后连续3年保持大幅增长,加之部分博士生培养周期延长^[19],2020年我国在学研究生达到314万人,比上述规划纲要确定的目标高出57.00%。

政策变化调整是政府调控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发展方式以及发展规模等的有效工具。高等教育政策的调整往往是基于多种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是高等教

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满足度、服务力的调整^[20]。在政策不变或新旧政策变化不大的情况下,通过历史数据外推进行预测比较有效;而当政策变化且新旧政策变化较大时,预测的难度相应增加,预测结果的精准度也会受到影响。政策已成为高等教育规模预测影响最大又难以准确把握的关键因素。

三、中美研究生教育规模预测与比较

阿特巴赫指出,美国的研究生教育体系被认为是成功和有效的,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学习借鉴的对象^[11]。21世纪初,就有一些文献认为我国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教育“已经或将要”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1],社会影响至今难以消除,有必要通过预测来进行澄清。

1. 预测指标与方法

本文对于研究生教育的规模预测,采用两种方法,一是授予学位的历史数据外推,二是研究生最新招生人数及其授予学位历史数据相结合的方法。方法二对于短期预测可以减少或避免后续年份招生政策变化的影响;对于长期预测,由于最新招生数距离预测时间点更为接近,方法二也会比方法一的准确度更高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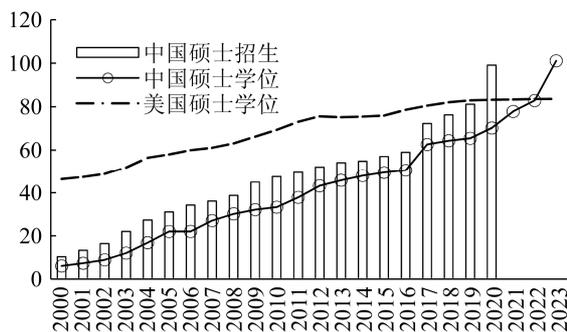
同时,衡量一个国家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程度及其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的程度,不仅要看授予研究生学位的绝对规模,还要分析每十万人口中授予研究生学位的相对规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2. 绝对规模预测与结果

2019年,我国授予硕士学位65.45万个,是2014年的1.37倍,年均递增6.44%。照此外推,2024年我国将授予硕士学位89.67万个,超过美国授予硕士学位的预测数量(83.80万个)。

从另一个视角看,近年来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数量增幅较大,2019年为81.13万人,2020年达到99.05万人。2000—2020年的21年间,我国授予硕士学位的数量之和为1997—2017年硕士生招生数之和的102.10%。据此推算,2022年我国授予硕士学位数量将达到82.84万个,仅比NCES预测的该年美国授予硕士学位数量少0.66万个(见图7);2023

年我国授予的硕士学位数量将超过百万个(101.13万个),远超美国的预测值83.60万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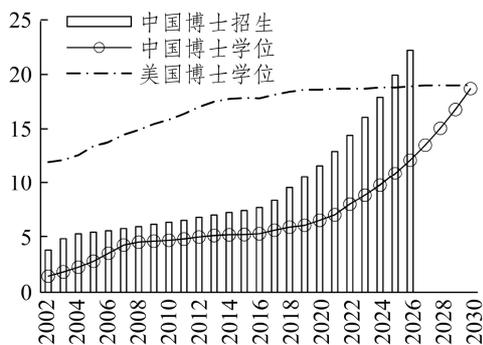


注:美国2019年及其后、中国2021年及其后为预测值。

图7 中、美硕士学位规模比较 (万个)

2020年,我国授予博士学位65585个,是2010年的1.38倍。照此外推,2030年我国授予博士学位数将达到9.07万个,还不到NCES预测的美国2029—2030学年授予博士学位数量(19万个)的一半。

换个视角看,2020年,我国博士生招生11.60万人,是2017年的1.38倍,年均增速为11.43%,如果博士生招生政策不作大的调整,2026年博士生招生数量可达22.21万人。2002—2020年,我国授予博士学位总量占1998—2016年累计招收博士生总量的84.17%,照此推算,2030年我国授予博士学位的数量将达到18.70万个,接近NCES对于2029—2030学年美国授予博士学位19万个的预测值(见图8)。但对于此后6年持续保持博士生招生高增长的必要性和挑战性,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注:美国2019年及其后、中国2021年及其后为预测值。

图8 中、美博士学位规模比较 (万个)

3. 相对规模的预测与比较

2019年,我国人口为14.00亿人,2009年以来年均增长0.48%。美国2009—2019年人口年均增长

0.71%，2019 年达到 3.29 亿人。照此外推，2023 年我国人口将达到 14.27 亿人，是美国同年人口数量的 4.22 倍。因此，即使届时我国授予硕士学位的数量达到预测值，每十万人人口授予硕士学位数量也只有 64.08 个，与美国相对规模的差距虽有所缩小（见图 9），但只有美国的 25.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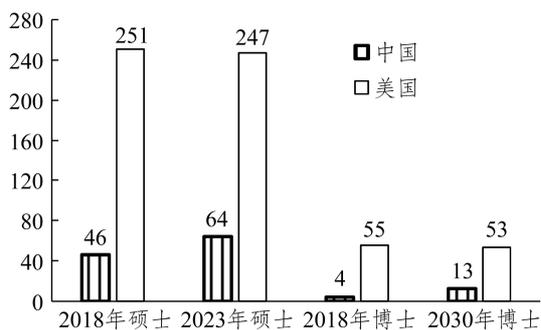


图9 中美两国每十万人人口授予学位比较（万个）

同样，2030 年我国人口预测将达到 14.75 亿人，为美国人口的 4.15 倍，即使届时我国授予博士学位的数量达到预测值，每十万人人口授予博士学位数量也只有 12.67 个，虽比 2018 年大幅提高，但只有美国的 23.72%。

4. 小结与讨论

从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和逻辑看，高等教育规模的适度扩大是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迫切需求的必要举措，是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是提高一个国家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人力资源水平，进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路径。20 世纪以来，全球高等教育出现“规模庞大的扩张”^[22]，这不仅成为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主流趋势，也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并发挥着日益深刻的影响^[23]。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既是全球高等教育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同时，也已进入后人均 GDP1 万美元时代，创新驱动发展在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中将发挥更大作用，更多的工作岗位对于高学历人才需求迫切，这对高等教育体系的规模和质量都提出了新要求^[24]。与此相适应，对于研究生教育的迫切需求将会持续。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绝对规模超过美国的趋势已经显现，但每十万人人口授予研究生学位数量的相对

规模还有较大差距，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进一步提高质量和满足需求，还应不断努力。

高等教育规模预测是调整政策和制定规划的依据和参考，但由于受到认识水平、方法科学性和规律把握能力的制约，精准预测的难度较大，需要加强动态监控和适时预测。我国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研究生教育规模的预测更应同时考虑绝对规模与相对规模，科学认识需求与质量之间的关系。同时，开展研究生教育预测及其比较，可以提供借鉴和参考，有助于澄清事实、理清思路，避免似是而非和盲目攀比。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运行逻辑有所不同，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再到普及化阶段的环境和条件，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当时的环境和条件，追赶超越必须以高于被追赶对象的速度发展，且往往不是匀速增长，应正确认识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理性和客观对待预测和比较，科学规划研究生教育规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自从改革开放后恢复招生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培养了大批服务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科技创新的高层次人才，为我国应对全球人才竞争、从研究生教育大国迈向研究生教育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25]。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指出，要坚持供给与需求相匹配、数量与质量相统一，保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培养能力相匹配的研究生教育发展节奏，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适度超前布局，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稳步扩大。应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提高辩证思维能力，正确看待规模与质量的关系，深化对于预测方法和发展趋势的研究探索，科学比较和客观判断，准确把握研究生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公平的辩证关系^[26]，着力推进研究生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7]应充分认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趋势，准确把握人民群众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新追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高层次创新人才的新需求，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立德树人、育人为本，增强辩证思维，开阔研究视野，坚定信心信念，健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研究生招生计划调节机

制,建设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系,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致谢: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林晓青等老师审阅了本文并提出修改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 [1] 高文豪,崔盛.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调整的国际借鉴[J].大学教育科学,2021(1):111-119.
- [2] 克尔,马希文.从人口预测看今后二十年美国的高等教育[J].科技导报,1985(4):54-55.
- [3] TROW M.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 Educational researcher, 1988(4): 13-23.
- [4] 科恩.美国高等教育通史[M].李子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407-408.
- [5] 刘延松,张炜.高等教育规模预测模型讨论及实证研究[J].辽宁教育研究,2007(2):25-28.
- [6] 林惠青.试析9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目标[J].中国高教研究,1993(2):21-24.
- [7] 别敦荣,易梦春,李家新.“十三五”时期研究生教育发展思路[J].中国高教研究,2016(1):83-90.
- [8] 比彻,特罗勒尔.学术部落与学术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M].唐跃勤,蒲茂华,陈洪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0.
- [9] 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71,261.
- [10] KERR C. 大学的功用[M].陈学飞,陈恢钦,周京,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前言.
- [11] ALTBACH P G.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J].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1998(11): 347-356.
- [12] 张炜.中美两国高等教育学生规模的比较与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2008(8):104-109.
- [13] 谈松华,诸平.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五十年回顾[J].高等教育研究,1999(5):42-47.
- [14] 赵庆年,曾浩泓.我国高等教育何以迅速迈入普及化——基于供需关系的视角[J].高等教育研究,2020,40(10):35-45.
- [15] 毛建青.高等教育规模定量预测的常用方法综述[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8(2):9-12.
- [16] 胡顺顺,刘志民.2020年中国高等教育规模预测偏差成因分析及重估[J].复旦教育论坛,2017,15(4):10-16.
- [17] 钟秉林.“十四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与关键[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23(1):1-8.
- [18] 张炜.中美博士研究生教育发展趋势比较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8(5):9-17.
- [19] 张炜.博士研究生退出和延期的数据测算与讨论[J].研究生教育研究,2021(1):1-6.
- [20] 彭红玉,张应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政策文本与实施效果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28(6):32-39.
- [21] 张炜.中美研究生教育规模和结构的比较与思考[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3(7):39-42.
- [22] 鲍威.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理论解释与扩张机制[J].教育学术月刊,2012(8):3-11.
- [23] 廖苑伶,周海涛.普及化趋势下国外高等教育系统变革研究综述:理论与实践[J].江苏高教,2021(1):7-13.
- [24] 李立国.后人均GDP1万美元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J].高等教育研究,2020,41(9):4-17.
- [25] 李锋亮,王瑜琪.研究生教育规模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与本专科教育规模的比较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21(3):75-81.
- [26] 张炜.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高质量特征与要求[J].中国高教研究,2018(11):5-10.
- [27] 习近平对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EB/OL].(2020-07-29)[2021-11-11].http://www.gov.cn/xinwen/2020-07/29/content_5531011.htm.

(责任编辑 黄欢)

第五届研究生教育学研究生学术论坛成功举办

本刊讯 2022年1月23日,由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和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大学中国博士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教育中心、天津大学教育学院、《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编辑部、《江苏高教》编辑部和《研究生教育研究》编辑部协办的第五届研究生教育学研究生学术论坛在线举办,有来自境内外80余所高校和期刊的800余名师生参加。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分为九个平行论坛,共有36位优秀论文作者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专家组逐一进行点评。平行论坛结束后,开展了“期刊与作者面对面”沙龙活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主编叶赋桂、《江苏高教》副主编肖地生、《研究生教育研究》编辑部执行主任黄志广、《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吕文妙、《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副主任王者鹤、《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执行主编周文辉等期刊负责人参与沙龙活动。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研究生关注研究生教育,共同助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黄欢)